

方言撷趣

乡音已老

成宝东

语言学家吕叔湘在《语言的演变》中说：“语言的变化，短时间内不容易觉察，日子长了就显出来了。比如宋朝的朱熹，他曾经给《论语》做过注解，假如当孔子正在跟颜回、子路他们谈话的时候，朱熹闯了进去，管保他们在讲什么，他是一句也听不懂的。不光是古代的话后世的人听不懂，同一种语言在不同的地方经历不同的变化，久而久之也会出现这个地方的人听不懂那个地方的话的情况，形成许许多多方言。”

胶东方言特色鲜明，无论语音、词汇还是语法，都可看出古代汉语在当今语言中的遗留，帮我们一窥语言演变的轨迹。

从语音上看，胶东方言保留了一些古音。比如京剧道白中，“哥”念作guo，胶东方言中也念作guo，如今六七十岁以上的老人都把“大哥”叫作“大guo”；“北”念作be，“白”念作bo，也与胶东方言读音相同，胶东民谚“财宝不漏白，漏白有人夺”，“白”字读bo才能跟“夺”押上韵；“可”念作kuo，跟胶东方言也相同，如“可惜”的“可”在龙口方言读为kuo；还有“贼”念作ze，据记载，朱元璋早年参加郭子兴的义军，做皇帝后特别忌讳“贼”字，有些大臣在上书的贺表中有“作则垂宪”“圣德做则”等语，因“则”和“贼”同音，朱元璋怀疑这是讽刺他做过贼，便将这些大臣治了死罪。此外，如“人”在中古汉语里读作nin(胶东方言中“人家”读为niji，算是遗留的标本)，后来声母n脱落，读作in(与胶东方言读音相同)，再后来才变成了目前的读音ren。

胶东方言读音的形成跟一段历史有关。如果略微细心一些，会发现胶东方言的发音及声调跟山东内陆地区不太一样，而跟皖北、苏北乃至天津非常相似。比如“天津”二字的发音，胶东话跟天津话很像，这是因为明朝初年为加强海防，仅在山东半岛就设立了登州卫、莱州卫、宁海卫、安东卫、灵山卫、鳌山卫、大嵩卫、威海卫、成山卫、靖海卫等十一大卫及众多千户所，这十一大卫有六个在登州府(现在除莱州外的烟威地

区各县市区)境内，而登州卫又最大，驻兵数千之多。这些卫戍官兵多来自朱姓皇帝的家乡(皖北的凤阳一带)，拖家带口，人数众多，在地方上处于上层，容易在语言上形成因心理优势而造成的语言优势，以致登州府的人就在语言上被慢慢同化了。天津情况与此类似。

从词汇上看，胶东方言中遗留了大量古代的文言词语，比如“脰枕”“箸笼”“婴”“到如今”“如何(‘何’读为huo)”等等。著名胶东籍作家张炜在《芳心似火·土语考》中写道：如今这里的确可以找到一些被广泛使用的古词汇，而且它们一点都看不出萎衰的征兆。比如，即便是不识字的老婆婆，也会说“能矣”“甚好”“矜持”等文辞。这里至今称向日葵为“转莲”，多么形象美丽，因为它是棵随着太阳转动的莲花啊！葵花子被称为“转莲籽”，仿佛口感也美妙了许多。对那些穷困潦倒的生存状态，当地人们仍然沿用旧说“贏顿”，现在的中青年则多数称为“吃饭”……

数量众多的文言词汇遗留，一方面反映了文化的繁盛和历史的厚重。胶东先秦时是古莱子国故地，秦始皇曾经“过黄(龙口)、睡(福山)，穷成山，登之罘”。黄县、福山属于全国最早的县级单位，历朝历代名人辈出。

另一方面也是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使然。胶东地处山东半岛东端，远离交通发达的通衢大邑，在海运不够发达的时代，这里基本上是交通的死角，却也为古语的保留提供了保证。

在语法方面，胶东方言中词类活用现象比较明显，这显然是古语的遗留。比如“高贵”是个形容词用为动词；“风快”是个名词作状语；“饥困”是个偏义复词等等。子尾和儿化现象，看起来是读音问题，其实也是语法问题，因为词语加上子尾或儿化后，要么意思变了，要么词性变了。比如“鼻子”和“鼻儿”，“鼻子”是人体器官，而“鼻儿”是“器物上面能够穿上其他东西的小孔”；比如“招”和“招儿”，一个是动词，一个是名词；再比如“吃饭”和“吃儿饭”，都是动词，但“吃饭”是进行时，

“吃儿饭”则是完成时，意思是“吃了饭”。此外“尽用”“尽儿用”，从“全用”到“能用”，意思变了，词性也变了；而胶东方言中有时还把“不尽儿用”说成“尽儿不用”，这又是倒装了。

这些词类活用和子尾、儿化等语法现象的存在，使胶东方言在很大程度上体现出汉语准确、简练、形象的特点，一个状语省略了大段描写，一个儿化就改变了词性或时态，实有四两拨千斤之效。

当然，我们在感叹语言顽强的生命力时，更应该感叹的是方言触目惊心的消失速度。

只要稍微回忆一下，就会发现几十年前或者十几年前还在用的一些词汇，现在已经很少有人用了。现在五六十岁以上的人，大多叫父亲为“爹”，而五十岁以下的人基本都是叫“爸”；五十岁以上的人，一般称舅舅的配偶为“妗母”，四十岁以下的人则多叫为“舅妈”；二十年前，多数乡人还称吃饭为“(音dai)饭”，现在的中青年则多数称为“吃饭”……

不要说八百多年前的朱熹听不懂两千多年前孔子的话，现代人也听不懂朱熹的话，再过三十年，我们现在还在使用的一些方言肯定也没人懂了。方言为什么消失得这么快？除了国家大力推广普通话外，还有一个重要因素，那就是时代发展太快，新事物涌现得快，旧事物消失得快，而交通、通信、传媒等现代技术的迅猛发展，使整个地球成了一个“村”。全球化使我们不得不放弃一些传统而有特色的东西，只是为了跟千里之外的人们交流起来更加顺畅。于是，在十八线以外的县城，商场的服务员拿腔拿调地跟同乡拽着普通话；在偏远的乡村，老人们用泥土味十足的普通话教小孙子念着儿歌……

方言中荡漾着历史的回声，方言里积淀着文化的记忆，方言里流淌着唤起乡愁的血液。“老乡见老乡，两眼泪汪汪”，这是乡情的力量；“少小离家老大回，乡音无改鬓毛衰”，这也是乡音的执着啊！现在，我们是不是应该像保护文物古迹一样保护方言呢？

往事如昨

一块八毛钱的贺礼

肖宁

同学曲兰前几天回老家，偶然发现亲戚结婚时的大镜子上，赠送者一栏竟有我的名字，赶忙用手机拍照并微信发给我。这真是一件老古董，我拿着手机端详了半天，记忆拉回到四十多年前。

从古至今，亲戚朋友家中有喜，大家都通过各种方式祝贺，尤其是结婚这样的大喜事。喝喜酒送红包沾喜气，在当下习以为常，而在20世纪80年代，贺喜随礼并不是红包。那时，大家的工资都不高，也没有送礼金的习惯，往往是几位朋友同事凑一下，赠送一两件家庭生活用品，价值也不用很高，主要是表达贺意和纪念，兼顾实用。随礼五花八门，脸盆、花瓶、炒勺、不锈钢面盆、床单、被罩、餐具……贵点的还有高压锅、液化气灶、毛毯等等。随礼通常先征求下新郎新娘的意见，看看他们家中缺什么然后再送什么，防止用不上。最时兴的是送大镜子，镜子上方印着大红喜字，两朵牡丹花相拥，非常喜庆。

20世纪80年代初，城乡很少有宿舍楼，从县城到农村，百姓住的多是平房。胶东地区的民居，一般是小四合院，正房三到四间，一间是主卧，炕前放个桌子或五斗橱，桌子上摆放着木钟和花瓶等。桌子上方最时尚的是挂面大镜子，那可以说是当年婚房里的标配。物资缺乏、凭票供应的年代，买个大镜子谈何容易。

记得同学老苏大学毕业后分配在市里工作，哥哥结婚需要一面大镜子，他费了好大劲儿才弄到一张特供票，到百货公司买了个大镜子，花了十六元八角。镜子有了，怎么运回家可犯了愁。老苏的家在农村，离市里六七十里路，有长途客车但不舍得花钱，更没有私家车。困难再大难不倒英雄好汉，他找来纸壳将镜子包起来，再让同事帮着用绳子捆在自己后背上，然后跨上借来的自行车上了路。大镜子不很重，但面积大，像一个大锅盖扣在后背上，怕

摔怕碰怕大风，上下车都不方便。他小心骑行，遇到上坡还要下来推着走，就这样走走停停大半天，总算把大镜子背回了家，汗水不但把衣服湿透了，连包大镜子的纸壳也快成了纸浆。为了哥哥的大喜事，老苏同学真是拼了。

记得1981年元旦，我在县里工作，单位的王大姐准备结婚。王大姐是职业防治专家，爱人是军人。她是我们这拨年轻人中较年长的一位，也是结婚较晚的一位。单位小青年多，听说王大姐结婚，大家都非常兴奋。因为王大姐工作勤奋，乐于助人，是多年的先进工作者，平日里与大家相处很好。老大姐结婚，肯定是要送贺礼的。大家几经斟酌，决定凑份子给她送面大镜子。征得王大姐同意后，我们开始行动。大家启动各种关系，最后花十八元钱买回一面大镜子。镜子上方印着大红喜字，两朵牡丹花相拥，非常喜庆。

有了大镜子，还需要署上名题上款。我在单位的年轻人中年龄最小，这个活就落在了我的头上。“初生牛犊不怕虎”，也不知道哪来的胆子，我找来红油漆和毛笔，用拙劣的隶书在大镜子右上方写上赠新娘新郎新婚留念，左下方署上赠送者的名字。十位年轻同事，名字列了两排，并冠以同志。就这样，十个人赠送了一面大镜子，每人随礼一块八毛钱，真可谓礼轻情意重。

对这份贺礼，王大姐非常珍惜，四十多年一直保存完好。岁月沧桑，斗转星移，前几年王大姐从区劳动局的领导岗位上退休后，自学法律，现在忙于社会公益事业。当年的十位年轻同事各奔东西，忙事业忙家庭，如今都已过了耳顺之年。仔细看看十位赠送者的名字，既熟悉又陌生，有的已多年未见面，还有的已英年早逝。

一面大镜子，记录了一段难忘的历史，凝聚了一群热血青年的友谊和真情。